

中国新文艺大系

1949—1966

短篇小说集

上卷

中国文联出版社

中国新文艺大系



中国文联出版社

中国新文艺大系总编辑委员会

总 顾 问 周 扬

总 主 编 陈荒煤

副总主编 冯 牧 李 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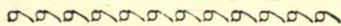
总 编 委 陈荒煤 冯 牧 赵 寻

张 庚 孔罗荪 王朝闻

李 庚 江晓天 许觉民

《中国新文艺大系〔1949—1966〕》各分集主编

短篇小说集	葛洛	戏剧集	张庚
	刘剑青	电影集	罗艺军
中篇小说集	孔罗荪	曲艺集	罗扬
	朱寨	音乐集	周巍峙
诗集	张志民	美术集	吴作人
散文集	吴有恒		刘开渠
	黄秋耘		艾中信
杂文集	曾彦修	摄影集	陈伯萍
	秦牧		徐肖冰
报告文学集	陶白	舞蹈集	高帆
儿童文学集	穆青	书法集	游惠海
民间文学集	陈模	评论集	沙孟海
少数民族文学集	贾芝	理论史料集	冯牧
	晓雪		张炯
	李乔		



中国新文艺大系主要工作人员

编辑部成员 宋文郁 李景峰 陶国鑑
 邢沅 郑荣来
 出版负责人 李湜 陈树彬 方翕之
 装帧设计 张慈中

出版说明

(一) “五四”以来的中国新文化运动，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六十多年来，中国的新文艺取得了极其丰硕的成果。这些成果，深刻地反映了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各个历史时期中国人民的生活和斗争。它是本世纪中华民族所创造的宝贵的精神财富，是中华民族对于人类文化的巨大贡献。编纂一部反映“五四”以来中国新文艺优秀成果及其发展历程的拔萃本总集，目的是为继承和发扬革命传统、进一步繁荣我国的社会主义文艺事业，为研究、总结我国文学艺术的发展、衍变的规律和历史经验，提供一套比较系统、完整的资料。我们也期望这部总集，能帮助广大读者，在浩如烟海的出版物中选择精英，统览各个时期的优秀文艺作品，从中汲取教益；并能有助于世界各国人民了解中国和研究中国的新文艺，促进国际文化交流。

(二) 《中国新文艺大系》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编纂的指导思想，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遵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力求实事求是地、全面地反映我国新文艺在不同时期的历史概貌。

(三) 《中国新文艺大系》按历史时期分辑，由近及远地编纂出版。从“五四”运动前后到一九八二年底，共分五辑：第一辑〔1917—1927〕；第二辑〔1927—1937〕；第三辑〔1937—1949〕；第四辑〔1949—1966〕；第五辑〔1976—1982〕。若干年后，将继续编以后的各辑。

《中国新文艺大系》每辑按文学艺术的门类和体裁分集，各辑的分集根

据不同历史时期的实际情况有所不同。所有分集均有主编撰写的导言。

(四) 这次出版的《中国新文艺大系〔1949—1966〕》为第四辑，共十九集。其理论部分包括评论集和理论史料集；文学部分包括短篇小说集、中篇小说集、诗集、散文集、杂文集、报告文学集（包括通讯、特写）、儿童文学集、民间文学集、少数民族文学集；艺术部分包括戏剧集（话剧、戏曲）、电影集、曲艺集、音乐集（声乐、器乐、歌剧）、美术集、摄影集、舞蹈集、书法集；优秀的长篇小说本辑不列分集，其目录由理论史料集收选。

本辑的编纂，仍然聘请著名专家、学者担任各分集的主编；仍然坚持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对十七年的作家、艺术家和他们的作品进行全面衡量，同时考虑某些作品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所具有的代表性，强调尊重历史、反映历史，强调质量第一，作到精选、严选、拔萃与代表性相统一，全面地反映新中国十七年文艺的概貌。

香港、澳门、台湾作家的作品，因资料不全，难于精确选拔，暂不收录，俟条件具备，另行增补。作品编排一般以首次发表时间或所据版本的时间为序，少数分集分类后再按时间先后排列。个别作品收入本书时，作者作了少量的文字改动或由编者订正讹错。

(五) 《中国新文艺大系》的编纂，是在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及中国新文艺大系总编辑委员会的领导下，依靠文艺界的大力支持、组织广泛的社会力量进行的。工作中我们还得到有关部门及海内外专家、读者的热情赞助，谨在此一并表示谢忱，并恳请惠予教正。

中国新文艺大系编辑部

一九八七年五月

序 言

刘 剑 青

接受编辑这本选集的任务，深感责任重大。我们在广泛征集资料和听取多方面意见的基础上，重新阅读了四百多万字的作品，经过反复研究、斟酌和讨论，遵循恩格斯提出的评价文学作品的“美学观点和历史观点”，力争为国内外读者提供一部能反映新中国建国十七年短篇小说总体面貌及其发展历程的选本。本集收录的作品，大体上按照作品发表时间先后的顺序排列。限于篇幅，入选者的作品原则上一人一篇，少数人的两篇，极个别的三篇。

建国后的十七年的短篇小说创作，继承并发扬了以鲁迅为旗手的“五四”新文学运动的优良传统。

新文学运动推出的一批作品，在思想内容上，广泛地揭露了旧社会的矛盾和黑暗，歌颂奋起抗争的战斗精神；在写作方法上，打破了陈旧的模式，焕发出了新的艺术光辉。正如鲁迅所说，新文学运动中涌现的作家，提倡“社会写实的文学”，敢于“真诚地、深入地、大胆地看取人生并且写出他的血和肉来”。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都给新文艺运动以高度的评价。

新文学运动那写现实、为人生的主张，得到了广泛的实践，并随着时代的前进而发展，工农劳动群众终于在文学作品中占据了主人公的地位。这在我国文学发展的历史上是一次划时代的变革。这种变革不仅具有重大现实意义，使新文学在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买办资本主义统治的民族民主革命中，发挥了“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

思想武器的作用，而且具有深远影响，为新中国的社会主义文学奠定了基石，开拓了道路。

二

建国前夕，在北京召开的第一次文代会，结束了解放区和国民党统治区两支革命文艺队伍长期被分割的局面。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揭开了我国社会主义文学发展的序幕。在我国从战争环境基本上转入和平建设这样一个新的历史条件下，广大文艺工作者表示要坚持实践新的文艺方向，即坚持文艺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服务。共同的方向，共同的愿望和理想，使一支阵容强大、实力雄厚的创作队伍形成了。在这支队伍中，有许多卓有成就的老作家和在他们的影响下的更多的后起之秀。他们满怀处于历史的新的起跑线上的激情，坚定而又自觉地走上了与新的人民群众相结合的道路。他们从社会主义建设的斗争生活中取材，努力反映新的生活，塑造新的人物，提炼新的主题，展现新的世界。他们的作品，充满了革命乐观主义和绚丽的理想色彩。尽管当时不少作家洞察生活的能力和艺术功底与他们自觉担负反映新时代的使命还不相适应，加上后来左倾文艺思潮的影响，出现了不少趋时的、艺术生命短暂的作品，但这掩盖不住作为年轻的社会主义文学的朝气和声势。经过时间筛选而存留下来的优秀作品，其思想内容的现实性、深刻性，艺术形式的民族化、大众化，较之建国前的作品，都有了新的进展，显得更加充分、更加鲜明了。就其反映生活的范围和塑造的人物形象而言，也有了新的开拓和展现。例如描写工业建设方面的斗争生活，反映兄弟民族与边远地区的生活，在建国前是十分罕见而在这时期得到了较多的反映。可以说，这些作品从各种不同的生活侧面，反映了劳动人民当家作主时代的多种画面和精神面貌，具有帮助和鼓舞群众开创新生活的力量。

一九五六年春天，我国完成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制度基本建立，全国工作的重点从急风暴雨的阶级斗争转移到发展经济、文化建设上来，为了适应当时这一历史性的转折，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把科学文化与文学艺术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上来，以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的需求，毛泽东同志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

针。这个方针的提出，是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和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的科学事业与繁荣文学艺术的问题紧密联系在一起。按照这一方针，“艺术上不同的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科学上不同的学派可以自由讨论”，“艺术和科学中的是非问题，应当通过艺术界、科学界的自由讨论去解决”，因为“正确的东西总是在同错误的东西作斗争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真的、善的、美的东西总是在同假的、恶的、丑的东西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的”。这是真理发展的规律。在这个重要方针指引下，广大文艺工作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象潮水一样奔涌而来，思想十分活跃。作家们开始进行思想和艺术上的大胆探索，努力发挥各自的艺术个性，以丰富多采的题材、人物、主题和风格，争奇斗妍，各展所长，形成文坛上百花初放的繁荣景象。这期间出现的动人心弦的佳作，皆以作家对生活的独特发现与理解，对艺术的探索与创新为其主要特色。这些作品真实地反映现实生活，勇敢地揭露社会矛盾，激励或启迪人们面对现实，同阻碍我们事业前进的各种消极现象作斗争，从而给社会主义文学注入了刚健、清新的血液——突出了文学的批判性的功能，在当时文坛内外引起了广泛而强烈的影响。

正当作家们心情舒坦、凌云纵笔，驰骋于真实深刻地反映广阔的社会生活，耕耘从来未被开垦的处女地，拓展艺术空间，变文学单一、狭隘的功能而发挥多种社会效益，即从廉价的乐观主义转向对严峻现实纵横观察与思考的时候，党发动的反右派斗争出现了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出现了严重扩大化的错误。这种错误表现在文艺界，既中断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贯彻，又伤害了一大批文艺工作者，其中包括卓有贡献的老作家、理论批评家和富有才华、勇于探索的中青年作家，这就严重地挫伤了文学艺术创作和理论开拓的积极性，并导致了历史性的倒退。在许多别具思想艺术特色的优秀或比较优秀的作品被当作“毒草”锄掉的过程中，一套反现实主义的理论畅行无阻，文艺批评变成“唯一”的政治批判；随意滥用的阶级分析和阶级斗争的观点，助长了庸俗社会学批评的飞扬跋扈；蔑视文学固有的特征和艺术规律，乱贴阶级标签，否认无产阶级劳动人民的人性美、人情美，堵塞对文学批判功能的探索，提倡一个阶级一个典型，等等。反现实主义的理论和某些创作实践互为因果，形成恶性循环；所谓“资产阶级人性论”，所谓

“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帽子，时时悬在作家头上，取材构思，提笔写作，诚惶诚恐，如履钢丝，创作的道路越来越窄，文学创作中早已出现的公式化、概念化、脸谱化的倾向更加泛滥……这样的趋势，遭到了广大读者理所当然的冷漠、厌弃，同时引起了文艺领导的高度重视。周恩来同志于一九六一年六月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上的讲话，陈毅同志于一九六二年三月在全国话剧、歌剧、儿童剧创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实际上就是对当时文艺指导思想和理论批评的“拨乱反正”。他们总结了建国以来文艺工作的经验教训，围绕发扬政治民主和艺术民主的问题，阐发了一系列关于文艺领导和文艺规律的问题。根据这两次会议精神起草的“文艺八条”，经党中央批准下达全国各文艺团体试行之后，才打破了文艺界噤若寒蝉的沉寂，逐渐又出现了“百花齐放”的某种繁荣景象。可惜好景不长，这种起死回生的转机方露端倪，又发生了历史性的蜕变，被一场较之过去规模更大、时间更长、危害更深的“文化大革命”葬送了。

社会主义文学创作，出现了为时近十年的严重断裂！

回顾建国十七年的文学历程，真是惊心动魄，令人感慨万千。要全面准确地估计十七年短篇小说创作的成败得失，我们一时还难胜任，有待于文学史家、评论家的深入探讨。这里，我们只能粗略地说：尽管建国以来的不断的政治运动，使年轻的社会主义文学创作经历了艰辛而曲折的道路，蒙受了重大的损失，但是，无论如何也不能低估作家们开创社会主义文学新天地所取得的重要成就和教训。十七年这一特定的历史时期，斗争激烈，有福有祸，有喜有悲，培养、锻炼了一批作家，特别是那些经过战争考验或来自社会主义建设第一线、恪守现实主义原则、直面人生的作家，在迭起的政治运动和文艺风浪中，虽然难于摆脱时代的局限性，在自己的一些作品中不可避免地留下了或深或浅的瑕疵，但是，由于他们忠实于历史和生活的真实，尊重文学的特性及其发展规律，抵制趋时媚俗的舆论压力，坚持从客观现实和自己对社会生活的真切感受、理解出发，透过生动的艺术形象来表现生活，从而为我们留下了至今看来仍有重要认识意义和审美价值的作品。以“历史和美学”的观点为准绳来衡量，十七年优秀短篇小说创作所取得的成就，在我国文学运动的发展史上，可以说是具有揭开社会主义文学新篇章的划时代意义

的。

三

黑格尔说：“每种艺术作品都属于它的时代和它的民族，各有其特殊环境，依存于特殊的历史的和其它的观念和目的。”建国十七年的短篇小说，作为年轻的社会主义文学，确实有它不同于我国任何历史时期文学发展的显著标志，从内容到形式，具有它的鲜明的历史特点、民族色彩和强烈的社会意义。如果把文学当作认识社会与人生的一个窗口，从这本选集中，读者大体上可以多侧面地看到新中国诞生前后及其艰难曲折的奋进历程，一代风流人物埋葬旧社会、开创新天地的英雄壮举，以及普通劳动人民为了主宰自己的命运，于惨酷的革命战争环境或复杂的建设斗争中显现出来的身姿面影，他们在各自独特境遇中的胜利与失败、进步与觉醒、欢乐与苦恼、理想、愿望与意志的精神风貌和品德。其中许多传诵一时的名篇佳作，例如《山地回忆》、《登记》、《农村散记》、《柳堡的故事》、《大青骡子》、《夜归》、《粮秣主任》、《春种秋收》、《黎明的河边》、《党费》、《宋老大进城》、《三月雪》、《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小巷深处》、《父女俩》、《明镜台》、《红豆》、《改选》、《国际友谊号》、《达吉和她的父亲》、《延安人》、《百合花》、《“锻炼锻炼”》、《山区收购站》、《新结识的伙伴》、《山那面人家》、《我的第一个上级》、《潘虎》、《回国以前》、《新生》、《惠嫂》、《团圆》、《金牛和笑女》、《陶渊明写〈挽歌〉》、《羊舍一夕》、《彩霞》、《撒尼大爹》、《赖大嫂》、《“老坚决”外传》、《长长的流水》、《开顶风船的角色》、《路考》、《铁笔御史》、《沉船礁》等，它们以或丰富或新颖或深沉的生活内容和不同的艺术色彩，反映了时代精神和人民群众的心声。对其中某些作品的现实意义和作用，曾经有过大的褒贬，争议，乃至批判，然而“真金不怕火炼”，历史老人驱散了恼人的团团烟雾之后，它们所固有的价质更加晶莹剔透、夺人眼目了。这一大批流传下来的作品，虽然不能说字字珠玑，没有任何疵点可指，但就其整体面貌来说，都具有某一方面的代表性，即寓独特的艺术个性于共性之中，为开拓社会主义文学创作实践，奠定了比较坚实的基础。

纵览这批作品，不难发现足以令人深思的几个突出的特点：

其一，这批作品的作者，从民族民主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先后涌现出来的老中青作家，他们不是躲在象牙之塔里的文人墨客，不是游离于革命战争和建设生活之外的旁观者、徘徊者，不是为了糊口或追求个人名利而营造自己的艺术殿堂。他们是革命和建设队伍中的一员，是参加不少革命时期斗争实践的战士（持枪的和 not 持枪的战士）。他们对国内革命战争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意义，以及对战争与建设和民族存亡、国家盛衰、人民祸福休戚与共的认识，反映在作品中，既是他们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理论的写照，又是各自生活经历和革命实践的深切体验。他们提笔写作的动机、信念和热情，既出于时代的召唤，又来源于深厚的使命感。著名作家峻青在谈到自己为什么写作的时候说：“在战争中，我看到了许多英勇顽强忠诚无比的英雄人物，他们为了党和人民的事业，奋不顾身地战斗着。许多战友在我的身边倒下去了，直到流尽了最后的一滴血以前，还不停止射击。这一切，都深深地感动着我，教育着我，给我打下了永恒不灭的烙印。每一想到这些人物的时候，我的心就强烈地激动起来。而在这种时候，我就开始意识到：我必须把这些使我感动的英雄事迹，讲出来，写出来，使更多的人都知道。”这一段话很有代表性。几乎为许多作家所共有的这种创作的激动和愿望，使他们坚定而又自觉地把自已的创作纳入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服务的轨道。把文学作为认识生活和改造生活的手段，当作“帮助群众推动历史前进”的战斗的精神武器。《黎明的河边》等一批反映革命战争生活的作品，会使我们深刻地感受到：革命战争本身所具有的传奇色彩、叱咤风云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史诗时代动人的悲壮画面和情感，饱和着人民的理想、愿望、意志和要求，展现于“典型的瞬间”，又是那样自然和谐地融为一体，闪烁着不灭的时代精神火焰，至今读起来，仍不减动人心魄的艺术力量。

建国后，在一段相对和平稳定的时期，熟悉革命战争时期武装或非武装斗争生活的作家，努力使自己的创作进程同时代现实面临的新课题相联系，但是已经不满足于描写一般化的战争题材和主题，而是把笔触深入到积存、沉淀于自己内心深处鲜为人知的生活素材中去，从自己所酝酿、创造的艺术世界中，去开拓新的艺术空间，表现作家独具慧眼所发现的具有现实意义的

生活真谛。例如孙犁、茹志鹃、肖平、刘真、石言、茵子、李纳等人的作品，皆以清新浓郁的生活气息、真挚的人际关系、纯朴的思想感情和完整的艺术形式，扩大了我们的生活眼界和艺术视野。这些作家的创作实践和作品本身所具有的动人的思想艺术力量表明：只要作家投身于变革现实的斗争，与人民群众的思想感情息息相通，共同创造新生活，就获得了创作的充分自由。尽管他们选择的不是重大题材，没有触及现实的本质矛盾，没有描写披荆斩棘式的英雄人物，但是“从血管里流出来的都是血”。他们从普通战士和劳动人民的日常生活工作中，去撷取，开掘深深感动了自己的人和事，依然能够扣紧时代脉搏，创作出足以引起众多读者共鸣和赞赏的作品。

其二，许多作家并不满足于有如在老的森林里反复狩猎的创作活动。他们以饱满的政治热情，严谨的现实主义态度，面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新事物、新矛盾，按照自己对生活的观察和理解构思作品，使自己的创作与时代、社会发展相适应，又和那些粉饰现实、图解流行政治概念的平庸化的趋时之作划清界限，努力以真实可信的多种生活图景，或及时敏锐地反映急速变化的生活，唱出对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的赞歌；或艺术地提出和回答人民群众普遍关心的问题，使作品成为推动工作的战斗武器；或描写、揭示不同阶层人物的性格、命运及其相互关系的变化，焕发新时代的灿烂光辉，蕴涵对历史与未来的思索。总之，他们认真探讨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多种艺术途径，力争适应人民群众多样化的审美需求。

时代环境、社会生活直接影响着作家的创作。作为生活在一定历史时期的作家，他们对现实的观察和认识，难于超脱一定时代的制约和影响，在他们的作品中必然留下时代局限的烙印。大量的反映农业合作化运动的作品，就其思想倾向而言，都是以流行的政治态度来热情肯定或赞颂这一运动的，未能发现或触及隐藏在运动底层的深刻的社会矛盾，即靠主观意志搞出来的“一大二公”的生产关系与当时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不相适应的严重矛盾，从而影响了作品对历史真实的反映，削弱了现实主义的战斗精神。不过，也不能一概而论。令人欣慰的是：以反映农村生活著称的作家赵树理、周立波、王文石、马烽、康濯、西戎等，尽管他们的某些作品对现实生活的认识，未能超越当时一般的高度，但是，由于他们没有放弃现实主义，没有违反

生活的真实，而是坚持描写自己所熟悉所理解的生活和人物，结果忠实地再现了历史的真实景象。重新鉴赏如《“锻炼锻炼”》、《赖大嫂》、《“老坚决”外传》、《沙滩上》这些作品，联想当时它们受到的某种非议、攻击乃至“大批判”的所谓“依据”，会使人觉得有哭笑不得和荒唐滑稽之感。正因为它们冲破了创作上的某种禁忌，真实生动地触及到农村生活的“阴暗面”，写出了一些颇具典型意义的所谓“中间人物”、“落后人物”与他们所生活的社会环境的磨擦、冲撞，对农村现实生活提出了一些与当时流行的政治概念有所不同的看法，倒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社会的某种本质矛盾。例如，我们从《“锻炼锻炼”》所展示的生活图景中，可以清楚地感受到：并非农村阶级敌人的猖狂进攻阻碍、破坏着农业合作化事业的发展，而是来自农民内部的“自发势力”和当时流行的某种思想的矛盾斗争，以及不科学的生产方式、劳动组织管理没有正确妥善处理，才形成人际关系紧张，不能充分调动和发挥农民的生产劳动积极性。

其三，恪守革命现实主义传统的作家，在“写真实”的问题上，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到歌颂光明与暴露黑暗的问题。由于左倾思想的干扰、阶级斗争扩大化和对待文艺作品简单粗暴的态度，曾在一定时期内把歌颂不歌颂光明当作判断作品政治倾向的标准，致使许多作品因为“干预生活”、“揭露阴暗面”而被定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草”。重新鉴赏诸如《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爬在旗杆上的人》、《改选》以及《陶渊明写〈挽歌〉》这些作品，尽管人们可以从思想上、艺术上指出它们这样那样的缺陷或弱点，却无论如何得不出那样可怕的把作品置于死地的结论。所幸历史毕竟是公正的，早已为它们恢复了名誉，这教训应当记取。现在看来，这些作家审时度势，基于对现实生活独到的观察和真切感受，以对人民利益、对社会主义事业高度负责的深厚情感，勇于揭示社会矛盾，敢于冲击陈旧观念，正是一个革命作家不可推卸的神圣使命。他们个人为此付出的惨重的代价，为我们换来了、增添了达到更充分的现实主义的一缕光辉。

其四，在为工农兵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指引下，新中国带来的巨大变化，现实生活的丰富多采，时代革命精神的高扬，文学与群众生活的紧密联系，艺术方法的渐趋成熟，促进了短篇创作的

题材、主题、人物、风格朝着多样化、民族化、群众化的方向更健康地发展。

十七年的绝大部分优秀作品，给人一个最突出的审美感受，就是在很大程度上丰富了、更新了“五四”以来文学的内容和形式，成为如列宁所说的替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服务的文学。在文学题材、主题的开拓方面，无论从纵向或横向上看，无论从取材角度和对主题的提炼上看，都取得了可喜的多样化的新收获。在纵向上，对建国以前中国革命所走过的艰苦道路，所进行的英勇斗争，作了认真的思索和冷静的审视，以饱含时代气息的笔墨，开掘出具有历史和现实意蕴的主题。在横向上，建国后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各条战线上五彩缤纷的斗争图景、社会关系，以及变革社会中出现的新的矛盾、新的事物、新的课题，都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反映。

现实题材和革命历史题材并存、发展的创作局面，也相应地带来了人物形象的多样化。关注人的命运，刻画人的性格和心灵，“根据实际生活创造出各种各样的人物来，帮助群众推动历史的前进”，是革命现实主义文学的中心课题，许多作家为此进行了认真的探索 and 追求，并取得了不容忽视的重要成就，创造了一系列各种各样的人物形象，诸如多儿、小飞蛾、老水牛爷爷、李玉春、韩梅梅、周昌林、叶英、宋老大、林震、刘世吾、达吉、“吃不饱”、“小腿疼”、张腊月、吴淑英、田副局长、潘虎、收黎子、惠嫂、曹英、赖大嫂、黑成威、“老坚决”、鲁牛子、“铁笔御史”李镇平，以及朴玉丽、阿里、由力克……他们从不同的生活环境中，带着各自不同遭遇中显露出来的性格特点和精神风貌走出来，使你如见其人，如闻其声。虽然还不能说这批艺术形象都已经达到了典型化的高度，却可以说他们都具有重要的认识意义和美学价值，其中不乏达到性格和心理的丰富性和完整性的典型人物。例如《登记》中的小飞蛾。这个在旧社会饱尝不自主婚姻的痛苦、磨难而终于觉醒过来的人物，她的性格和心理发展变化的脉络是清晰的、完整的，蕴涵着相当丰富的生活内容。读者从中可以强烈地感受到：农村反封建的斗争和移风易俗的改造很不容易，虽然封建阶级的统治已被抛到历史的垃圾堆，但封建统治赖以生存发展的宗法势力、道德规范和各种陈腐观念的阴魂并未消散，还象恶魔一样拖住人们前进的脚步；然而在党的解放妇女政策的感召下，小飞

娥从受屈辱的命运中觉醒之后，勇敢地 and 女儿站在一起，免除了女儿重复自己的厄运，这种同传统封建观念彻底决裂的行动及其性格和心理的变化之光，照亮了新一代妇女的前进道路。《新结识的伙伴》中刻画的两个女生产队长——张腊月 and 吴淑兰，又以她们各自独特的性格美，折射出“大跃进”时期特有的色彩。从她们代表两个生产队争夺红旗、相互倾慕而又互助的关系上，从她们同丈夫、婆婆以及同周围人的关系的处理上，可以看到，她们已经成为能够体现自己的价值、掌握自己的命运、追求自己的理想的新时代的主人形象了。《我的第一个上级》所塑造的田副局长，也是一个成功的典型形象。他是农村普通的领导干部。表面看来，他是个不起眼的“怪人”：平时“走起路来总是低着头，背着手，慢慢地迈着八字步；讲起话来总是少气无力；处理问题总是没紧没慢拖拖拉拉”，简直让人“心里真有点恼火”。可是在同洪水作斗争的紧急关头，他却一反常态，判若两人：精神抖擞、雷厉风行，指挥若定，表现出大无畏的献身精神。你惊异吗？作家以符合人物性格发展逻辑的一连串细节，真实生动地揭开了这个“怪人”并不怪的底蕴，同时开掘出这个典型性格所具有的民族精神的内涵，这是很可称赞的。

在左倾文艺思潮的影响下，不少作家在刻画人物性格，特别是在描写劳动人民的人性美、人情美和内心世界的丰富性、多样性的问题上，存有很大的疑虑和戒心；一些简单化的粗暴批评，例如对《达吉和她的父亲》等著名作品连篇累牍的批判，更加严重地影响了作家在这个问题上进行广泛深入探索的积极性。五十年代末和六十年代中期，短篇创作中社会主义新人形象，确实程度不同地存在着类型化、概念化和单一化的毛病，缺乏人物性格的真实性和深刻性，这不能完全归咎于作家，更不能因此而忽视那些数量不多、质量较高的成功的艺术典型。任何时代存留下来的作品总是少数，正是这少数，代表着一个时期的文学成就。

我们也不能低估短篇创作中另一个显著的成就，即艺术风格多样化的发展趋势。十七年的历史环境和社会的审美需求，既促成许多作家能够熟练地运用短篇小说的多种形式，及时敏锐地反映急剧变化的现实生活，创作出表现时代风貌、时代精神的作品，同时，他们通过创作实践和辛勤探索，在艺术创造上也逐渐走向成熟，显露出各自的艺术风格或艺术特色。从赵树理的